

审美教育书简

[德] 弗里德里希·席勒著
冯至 范大灿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审美教育书简

【德】 弗里德里希·席勒 著
冯 至 范大灿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DM 04/23

Friedrich Schiller

Über die ~~A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Reihe von Briefen

根据 Schillers Werke, Meyers Klassiker-Ausgaben,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Leipzig. 译出

J0
XL

审美教育书简

〔德〕 弗里德里希·席勒 著

冯至 范大灿 译

责任编辑：王荣宅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邯郸地区印刷厂排版

河北保定科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415701-5

175页

850 × 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5.75千字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33,000册

统一书号：2209.23 定价：1.20元

目 次

中译本序言·····	冯 至 (1)
第一封信·····	(8)
第二封信·····	(12)
第三封信·····	(15)
第四封信·····	(19)
第五封信·····	(24)
第六封信·····	(27)
第七封信·····	(37)
第八封信·····	(40)
第九封信·····	(44)
第十封信·····	(50)
第十一封信·····	(56)
第十二封信·····	(61)
第十三封信·····	(66)
第十四封信·····	(72)
第十五封信·····	(76)
第十六封信·····	(83)
第十七封信·····	(87)
第十八封信·····	(91)
第十九封信·····	(95)

第二十封信	(102)
第二十一封信	(106)
第二十二封信	(110)
第二十三封信	(116)
第二十四封信	(122)
第二十五封信	(130)
第二十六封信	(136)
第二十七封信	(145)
附《论崇高》	(155)

中译本序言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接受友人的建议，于1942年2月起始翻译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那时我自不量力，既对于与席勒美学思想有密切联系的康德哲学毫无研究，又没有翻译哲学著作的经验，便拿起笔来译这部书，的确是一件冒昧而近于荒唐的事。翻译前几封信时，还比较顺利，到第十一封信以后，原文越来越枯燥，内容越来越抽象，译时困难丛生，仿佛也感到原作者为他思考的问题在痛苦地绞着脑汁。在技术方面，对于席勒当时运用的术语更不容易找到恰当的译词。又如 Spiel（游戏）、Form（形式）、Schein（假象）等日常惯用的词汇，席勒都赋予更为高深、甚至与一般理解有很大悬殊的涵义。这些字用中文固定的译法译出，很难表达出它们在《书简》中的重要意义，若另觅译词就会更为支离，发生曲解。虽然遇到不少不容易克服的困难，但是我在教书和写作的余暇，敌机空袭日以继夜的干扰下，还是断断续续在一年内把二十七封信译完了。译完后，自知这是一件失败的工作，便把译稿放在故纸堆中，不敢问世。时过四十年，几经变乱，不少心爱的图书信札，或途中失散，或室内遭灾，而这一束欲弃未能的旧稿却安然无恙，一再在我清理旧物时出现，反而成为我的负担。

范大灿同志研究文艺理论，尤关心德国文学古典时期的美学，他听说我有这部陈旧的译稿，一再向我问及。最后，我在

1982年怀着一种有丑不能不献的心情，把译稿找出来交给他，请他审校。他收到译稿后，细心校阅，做了不少有益的改动，并附加详尽的提要和注解，这也用去了他一年内大部分的业余时间。由于席勒把美分为“溶解性的美”和“振奋性的美”两种，而在《书简》中只阐述了前者，没有论及后者，范大灿同志又译出席勒另一篇《论崇高》作为补充。席勒这部著作的译本得以和关心美学问题的读者见面，主要是由于范大灿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回顾我的旧译，只能是译文的初稿，这译本标明是我和范大灿的合译，是符合实际的。席勒在这二十七封信里的思辨过程，译者在提要和注解里都试行做了说明，这里不另赘述，我只想把席勒写作《书简》的时代、席勒所提出的美的任务、以及我们怎样看待《审美教育书简》等问题略作论述和交待。

歌德在1829年3月24日向他的秘书爱克曼说：“我和席勒的结交完全有一些神灵在趋使；我们被引到一起，不早不晚，恰好在那个时期，我早已从意大利旅行回来，而席勒起始对于哲学思辨感到厌倦，这是很有意义的，对我们二人都产生最大的成果。”歌德于1794年与席勒定交。从1790到1794年是席勒潜心于哲学思辨的时期，这也正是欧洲各国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社会各阶层起着不同反应、思想意识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当时在德国，几乎每个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的思想变化都或多或少地与法国革命的影响有关，他们注视着革命的进程和发展，对于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激烈斗争互相消长的各阶段，常常表示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席勒哲学思辨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审美教育书简》，这部《书简》的产生也是与席勒对法国革命的看法有着

联系的。

席勒是德国文学狂飙突进后期的代表人物，他青年时期创作的剧本《强盗》（1781）和《阴谋与爱情》（1784），声讨强暴，抨击封建制度，揭发统治阶级的阴谋险诈和宫廷中的腐化堕落的生活，淋漓尽致，无异于向当时空气沉闷的德国吹起革命的号角。1782年《强盗》在曼海姆首次上演，轰动一时，成为德国戏剧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盛举，其意义的重大不下于八年前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出版。德国由于政治经济落后，革命条件没有成熟，狂飙突进运动缺乏社会基础，它不可能进一步发展为革命的行动。不进则退，它的声势也就逐渐消沉下去了。席勒也逐渐摆脱了狂飙突进的精神，转向研究历史，随后又钻研康德哲学。1787年席勒在剧本《堂·卡洛斯》里宣扬自由和人道主义理想，1789年他被聘为耶那大学有职无薪的历史教授，在就职讲演中热情称赞当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1791年，他著文评论狂飙突进一个著名诗人毕革尔（Bürger，1747—1794），指责他诗歌里的民族格调流于庸俗，不能表达全人的崇高的思想。这评论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应，实际上也是作者对自己过去的狂飙突进时期进行自我批评。

席勒就任耶那大学两个月后，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对象正是席勒在青年时期深恶痛绝并且身受其害的封建专制。席勒跟德国大部分思想家和诗人一样，对法国革命表示欢迎，希望“理性的王国”从此可以实现，他密切注意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演变。但是革命过程中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反复较量与残酷斗争，以及雅可宾派专政时的恐怖行动，席勒对此难以理解，认为这情形距离他设想的“理性的王国”实在太远了。当1792年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国民会议把《强盗》的作者作为革命

诗人推选为法国的名誉公民时，他对于法国革命已经从希望转变为失望了。

席勒过去的历史观认为人类从古以来是不断进步、不断上升的，他所处的时代，正如他在耶那大学就职讲演中所说的，是最值得赞颂的时代。这是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的思想。康德在《回答问题：什么是启蒙？》（1784）一文中指出，人的历史是从自然状态向精神与理性时代演进的历史。但理性时代是在辽远的将来。在这长远的路途中，当代（即启蒙时期）正处在人类结束自然历史、开始精神历史的转折点上，因为在启蒙时期人正在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和职责，使理性成为指导一切的原则。席勒接受了康德的观点，也认为人类发展的道路是从被感性支配的自然状态走向精神能控制物质的理性状态，人从自然人变为理性人，而当代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但是由于对法国革命的失望，他放弃了对于当代的乐观看法，在这一点上跟康德也就有了分歧了。

他怎样看他的时代呢？他在《审美教育书简》的前十封信、尤其在前五封信里对于时代的缺陷做了生动的描绘和批判。他说，上层统治阶级的生活是腐朽专横，下层社会是粗野暴戾。腐朽专横是席勒早已经历过的，至于粗野暴戾则是从法国革命得出的误解的论断。这时据席勒看来，他的时代并不能说是人的自然状态的结束与理性状态的开始，在这一方面腐朽、一方面粗野的社会，人还不能直接从自然人走向理性人，若要达到理性状态，首先要让人恢复健康，具有美的心灵，为此，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里开出了他的“济世良方”。

席勒在1791年，生活困苦，身患肺病，外边甚至一度谣传，他已在贫病中死去。丹麦奥古斯腾堡（Augustenburg）公爵和史梅尔曼（Schimmelmann）伯爵从这年十二月起，每年资助

席勒一千塔勒银币，以三年为限。席勒为了报答奥古斯腾堡公爵对他的帮助，从1793年2月起把他近年来对于美学的探讨用书信的方式报告给丹麦的公爵。次年二月，哥本哈根大火，前十封信在火中焚毁，席勒又根据自己留存的提纲重新撰写，共写出二十七封，于1795年在他创办的《时季女神》杂志上陆续发表。书信与论文不同，论文一般只写研究的成果，书信则陈述了作者思辨从开端到结论的过程。

席勒分析当时的社会是上层腐朽，下层粗野，并指出腐朽比粗野对于人类进步有更多的危害性。他看他那时代的人也是分裂的，而古希腊的人则是完整的人。分裂的人有两种冲动，那是感性冲动即物质冲动和理性冲动即形式冲动。关于两种冲动的存在，是当时德国文学和哲学里经常谈论的问题，在歌德《浮士德·城门前》一幕中浮士德向他的学生瓦格那说：

“你只知道有一个冲动，
啊，另一个你却全然无知！
有两个灵魂住在我的胸中，
这一个要跟那一个分离；
一个沉溺于粗俗的爱欲，
以执着官能迷恋人间；
另一个强烈地超脱尘寰，
奔向那往圣先贤的领域”

歌德这几行著名的诗句表达了两种冲动互相矛盾，难以调合。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里反复论述这两种冲动的特点：感性冲动的对象是生活，它要占有，要享受，被官能所控制，是被动的，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是自然人。理性冲动的对象是形象，它要的是秩序和法则，受思想和意志的支配，是主动的，处于这种状态的人

是理性人。但是这两种冲动各自都有强迫性，不能直接结合。若使这两种冲动能以结合，人从自然人走向理性人，中间必须架起一座桥梁，这桥梁是审美教育，让艺术充当使人恢复健康、具有美的心灵和人性的教师。而艺术的起源则由于人在这两种冲动之外还有另一种冲动，即游戏冲动。游戏冲动不受任何方面的约束，它也不带有强迫性。“游戏”一词可以说是自由的同义语，席勒认为，人在自由中才是全人，不是分裂的人。他在第十五封信里说：“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也才完全是人。”游戏冲动既能驾驭（感性冲动的对象）生活，从生活中取得素材，也能创造（理性冲动的对象）形象，用形象体现精神，因而它的对象是“活的形象”。这“活的形象”也就是艺术的本质。“活的形象”把感性与理性、被动与主动、物质与形式、变化与规律等等对立面都给结合起来了，成为从感性状态到理性状态、从物质到形式的桥梁。审美教育通过既有生活又有形象的艺术培养人的美的心灵和健全的人性，然后才能克服当前社会的腐朽与粗野，以及现代人的分裂现象，为将来全人类的和谐作准备。

如上所述，游戏冲动所创造的“活的形象”是在物质冲动即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即理性冲动之间起着桥梁作用。但是席勒越深入探讨这个处在中间地位的“桥梁”，这“桥梁”的中间性就越为减少，它的独立性越为增强。甚至说游戏冲动是人的本性，它有永恒的价值。这样，手段就成为目的了。

席勒看到时代的弊病，提出改变现状的方案，他不着眼于政治经济的改革，只求人性人心的改善，这是唯心主义者带有普遍

性的主张。梅林（F·Mehring）在1905年为德国工人写的《席勒评传》里说：“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筒暴露了我国古典文学的秘密，它们明显地足以证实，为什么十八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必须在艺术的领域里开展。但是它在试行从审美走向政治自由的道路时，却不言而喻地落了空。席勒在第十封信里已经承认，经验也许不是法官席，一个象这样的问题要由它来审判，而且他越深入于他思想丰富的研究，他越是把手段变为目的。”梅林从第二十七封信里引用了关于“审美假象的王国”一段话后，他紧接着说：“最后席勒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这样的美的假象国家是否存在，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他说，按照需要它生存在每个幽雅的心灵里，但它实际上也象是纯净的教会和纯净的共和国，只能在几个少数精选的团体里找到。这审美哲学的唯心主义自己就宣示为一种游戏，精选的卓越人士用这游戏给他们牢狱悲惨的四壁镀金，如今对饥饿的大众是一种嘲弄，若是有人期望他们只是‘在自由的可爱的虚幻里’摆脱他们的枷锁”。

马克思主义者梅林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席勒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席勒在当时的德国提倡审美教育，对于促进德国文化的发展，提高审美趣味，是有积极意义的，并且对于西方十九世纪的美学研究也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本世纪五四运动以前，鉴于中国政治腐败，社会黑暗，苦难中的人民望不见黎明的曙光，民主主义教育家蔡元培也曾吸取席勒的学说，规定美育是教育宗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后来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蔡元培的这些意见，其动机与席勒不无相同之处，其效果当时也是落空的，这和梅林批评《审美教育书筒》里所说的情况是很类似的。可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今天，若是把席勒唯心主义美学的思想根源抛开，仅就艺术的功能和艺术家的职

责而论，席勒的这部著作还是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的。

冯 至

1984年3月28日于北京

第一封信

【内容提要】

席勒申明，他研究美与艺术虽以康德的原则为根据，但不拘门户之见。他研究美的方法论基础是，美虽与感官及感觉有密切关系，但严格的科学研究必须使对象接近知性，因而有时不得不使对象避开感官和感觉，脱离它的直接表现形式。

蒙您惠允，现把我关于美与艺术的研究结果写成一套书信呈献给您^①。我深深感到这项工作的重要，但也感到它的魅力和庄严。我要谈的对象，同我们幸福生活中最好的部分有直接的联系^②，同人的天性中道德的高尚也不相违阔。我将在一个感受到并且实施着美的全部权力的慧心人面前探讨美的事物，而且在研究时一旦遇上既必须根据感觉又必须根据原则的地方，将由他来承担我工作中最艰难的部分。

我原想向您祈求一点恩惠，而您却仁慈地把它当作我份内的事；我做这事，不过是从心所好，而您却把它看作好象是我的一个功绩。您给我规定的行动自由，对我来说不是一种强制，反而是一种需要。我素来缺乏运用正规形式的训练，因而也就不至于

有由于误用这些形式而损害良好趣味的危险。我的思想主要是来自与自己内心单纯的商略，而不是主要来自丰富的世界经验或者读书的收获。我不否认我这些思想有它们的渊源，但我宁肯犯任何别的错误也不犯门户之见，宁肯因为这些思想自身的弱点而失败也不用权威和别人的势力来支撑它们。

诚然，我不愿向您隐瞒，下边的看法大多是以康德的原则为依据；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如果使您联想到任何另外的哲学学派，请您把这归之于我的无能，不要归诸康德的原则。是的，您的精神自由，对我来说，是不可侵犯的。您自己的感觉所提供的事实，就是我所根据的事实，您自己的自由的思维力所规定的法则，就是我研究时应当遵循的法则^③。

关于在康德体系的实践部分^④居支配地位的那些思想，只在哲学家当中有不同的看法，而一般人的意见——我自信能够证明——从来就是一致的。如果把这些思想从它们的专门术语中解脱出来，它们就成为一般理性的至理名言与道德本能^⑤的事实；而道德本能是智慧的自然为监护人类而设置的，直到人类有了明彻的认识而变得成熟为止。但是，正是这种专门的术语使真理在知性面前显现，又在感觉面前把真理隐藏。因为，遗憾的是，如果知性想要把握内感的对象^⑥，就必须先破坏这个对象。正如化学家一样，哲学家也只有通过分解才得到化合，只有通过人为的折磨才能获得顺从的自然的产物。为了捉住瞬息万变的现象，哲学家不得不给现象套上规则的羁绊，把它们美丽的躯体分割成概念，用贫乏的文字框架来保存它们那活生生的精神。这难道还值得奇怪，假使自然的感觉得在这样一个摹写中不再能看到自己，假使真理在化学分析家的报告中成了自相矛盾的断言？

因此，如果下面的研究为使它的对象与知性相接近而使它的

对象离开了感官,那就请您对我多少表示一点宽恕。前面谈到道德经验时所适用的一切,必然在更高的程度上也适用于美的现象。美的整个魔力是建立在它的神秘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魔力的各个因素的必然结合,魔力的本质也就随之被扬弃^⑦。

- 注释**
- ① 席勒于1793年到1794年初把他研究美学的心得写成书信,寄给曾在困难时期给予他慷慨帮助的丹麦奥古斯滕堡公爵。1794年2月哥本哈根宫邸失火,所有的信均不幸被焚。幸好曾有人传抄,前七封的手抄本被后人发现。应奥古斯滕堡公爵的要求,席勒于1794年9月到1795年中根据草稿重新整理这套书信,但在这过程中对原稿作了较大修改,并于1795年在他创办的《时季女神》杂志上分三次发表,成为完整的美学论著,与收信人无多大关系。1801年这套书信收入《短小的散文集》第三部分,只删节了个别段落和个别注脚,现在通行的《审美教育书简》就是根据这个版本。
- ② 席勒认为,通过美的享受可以满足人最纯正的爱好,使人得到“至乐”。
- ③ 这个研究所顾及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哲学学派,而只是未受任何哲学学派影响的读者的自由的思维能力。
- ④ 康德写了三大“批判”,亦即他的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纯粹理性批判》,主要内容是认识论,《实践理性批判》,主要内容是伦理学,《判断力批判》,主要内容是美学。这里所说的“实践部分”,即指伦理学。
- ⑤ 即直接的本能的道德感。
- ⑥ “内感的对象”(Objekt des inneren Sinnes),是通过观照就可意识到的内心活动,如道德要求等。
- ⑦ 这句话十分晦涩,大意谓:美的效果看来象魔力一样是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的,但它的各个因素必然地要结合在一起,而这时它那魔力的本质就随之消失。换句话说,美看来与感官的感觉有关,但要把握它的本质就必须通过知性的分析,而不能靠直接的感觉。

第二封信

【内容提要】

艺术是人类理想的表现，它是由精神的必然而产生的，不是为了满足物质方面的需求。但是，现今需要支配了一切，功利盛行，科学发达，艺术越来越失去了它的意义。另外，政治不再是少数强者的事，每个人都觉得政治问题的解决与他有或深或浅的关系，因而人们普遍地注目政治舞台，研究艺术和美似乎成了一件不适宜的事。不过，席勒认为，政治问题的解决必须假道美学问题，人们只有通过美才能走向自由。因此，他要顶住时代的需要和风尚，让美在自由之前先行。

我利用您给予我的自由，提醒您注意美的艺术这个舞台，除这以外，对这一自由难道还有更好的运用吗？当今，道德世界的事务有着更切身的利害关系，时代的状态迫切地要求哲学精神探讨所有艺术作品^①中最完美的作品，即研究如何建立真正的政治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为审美世界寻找一部法典，是不是至少说有点不合时宜呢？

我不想生活在另一个世纪，也不想为另一个世纪而工作。人